

#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 目次

### 〈書評〉

---

-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楊 昊 1
- Ann C. Hudock  
*NGOs and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by Proxy?* 吳宗憲 5
- Kongdan Oh & Ralph C. Hassig  
*North Kore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毛維准 8
- Michael J. Whincop  
*From Bureaucracy to Business Enterprise* 王光旭 12
- Greg Austin & Stuart Harris  
*Japan and Greater China—Political Economy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Asian Century* 賴郁蕙 17
- 許寶強  
《資本主義不是什麼》 邱頌恩 21
- 王銘義  
《對話與對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較量》 蘇軍瑋 25
- 連玉如  
《新世界政治與德國外交政策—「新德國問題」探索》 李 敏 29

#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〇五年六月  
第六期



- 
- |        |   |
|--------|---|
| 資深編輯顧問 | 高 朗、石之瑜   |
| 編輯顧問   | 王順文、莊國銘、廖高賢                                       |
| 主 編    | 莊文一   |
| 編輯委員   | 連澤、潘惠伶、蘇軍瑋、郭銘傑<br>李靜旻、李豫宜、洪健庭、吳昀展                 |
| 校外編輯委員 | 江妍儀、廖斌洲   |
| 發行單位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br>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br>電話：(02) 2391-875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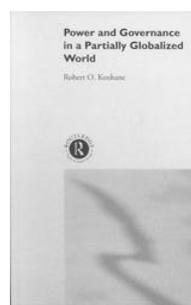
Robert O.  
Keohane

##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楊昊 / 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際關係組博士生

對於國際關係研究者而言，Robert O. Keohane 堪稱是學界公認的大師人物，特別是在理論研究與創新上投入了超過三十年的心血；從 1970 年代中期的複合互賴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ce）到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的研究系絡，一直發展至 1980 年代的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或所謂的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的理論紮根，以及近期延續制度論所發展的國際法制化（international legalization）與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等學理，均為國際關係（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社群提供了不少洞見（insights）。Keohane 早期的研究成果，曾在 1989 年匯集成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一書；特別是在第一章中，他正式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名稱來定位整個研究脈絡。<sup>1</sup>到了 2002 年，Keohane 再度出版本書並重新整理了自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出後十餘年的理論發展，同時亦進一步說明了相關知識累積的情況。

首先，在針對互賴與制度的探討中，Keohane 初步回顧了 1919 年所成立的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及隨之而興的各種國際制度。在實務上，Keohane 所概述的例子除了包含歐洲統合過程中的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環境議題上的京都議訂書（Kyoto Protocol），包括了 GATT 與 WTO



書名：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作者：Robert O. Keohane

出版者：Routledge.

出版地：London

出版日期：2002 年

頁數：288 頁

ISBN：0415288185

<sup>1</sup>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vii, p. ix, p. 2; Keohane 認為與其稱他為新自由主義者（neo-liberalist）或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倒不如制度主義者（institutionalist）來得貼切（p.3）。

等經貿方面的國際建制之實際運作。這些例子反映在學理上，則象徵著早期現實主義（realism）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在權力、世界政府以及國際合作上的諸多爭辯，以及晚近針對論及制度對國際談判之影響的辯論觀點（pp.27-38）。接續，Keohane進一步從現實主義與馬克斯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中，重新剖析自由主義本質上的複雜性，亦進而彰顯出國際自由主義作為分析國際合作與制度建立的重要基礎（pp.39-62）。為了解釋國際自由主義的邏輯，他嘗試以第四章中對於Hobbes之理性自利假設所形成的困境以及制度的回應等說明，呈現主權國家在當代世界政治中所面臨的互賴結構與合作問題（pp.63-87）。本書第五章則是與Celeste A. Wallander的合著文章，主要探討安全制度（如NATO）的分類與實際個案，並檢視制度本身在面臨變遷與調適中的演化過程（pp.87-114）。

在本書的第二個部份——法律在國際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Keohane從「工具性」（instrumentalist）與「規範性」（normative）等兩個視野回顧規則（rules）如何影響國際事務，並進一步指出這兩個視野其實均重視利益、聲譽以及制度的關鍵角色（pp.117-131）。接續，Keohane摘錄了2000年*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期刊中兩篇最重要的論文：其一（第七章）在國際關係學者與國際法學者的合作下，建立了「國際法制化」的理論原型。簡單來說，國際法制化與傳統國際公法的研究途徑有所不同，它是一個正在發展的理論概念，同時也是一個動態落實的過程。國際法制化囊括

了義務（obligation）、精確（precision）、以及授權（delegation）等抽象元素，論者透過這些元素建構出不同的程度標準，並援引來衡量各個國際制度或建制的法制化程度（pp.132-151）。接著在第八章，其焦點則是進一步結合各種國際制度與建制（如GATT與WTO）探討國際爭端解決的兩個理想型：國際（interstate）與跨國（transnational）的法制化動態過程，並強調這兩種型態依著法律互賴（judicial interdependence）、管道（access）以及相嵌性（embeddedness）<sup>2</sup>而有所不同（pp.152-189）。

在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中，Keohane從事了相對宏觀的理論/概念論述，點出全球化時代裡全球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治理的重要。特別是本書的第九章（其實是*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的導論）<sup>3</sup>不但探討了全球主義（globalism）<sup>4</sup>的概念與相關定義，透過分析層次（level-of-analysis）的觀點整合全球化與國內治理，以及全球化與國際建制、網絡（networks）、規範（norms）間的跨層次聯結關係（pp. 193-218）。

<sup>2</sup> 在此的「相嵌性」指爭端解決決議在無需政府採取行動的前提下所能被執行的程度（p.153）。

<sup>3</sup> 參見Joseph S. Nye, Jr. and John D. Donahue, e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0).

<sup>4</sup> 在此，Keohane與Nye, Jr.所強調的全球主義，其實與一般論者的全球化主張有一些概念層次上的差別。此處之全球主義，係指以互賴網絡所呈現出的一種當代世界的型態。這些網絡在實際的運作上蘊含了資本與財貨、資訊與理念或人員等不同元素的跨空間流動與影響。相較之下，若將一般論者所主張的全球化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概念應用在此一網絡中，前者將意味著全球主義的強化，而後者則是意指全球主義的衰退（p.193）。

為了說明在全球化下各種國際建制或治理機制的發展，Keohane收錄了與Nye合著的另一篇文獻，進一步論證多邊合作中的「俱樂部模型」(club model)以及在國際制度運作中所涉及的民主合法性問題(pp.219-244)。制度的運作與相關挑戰在日愈複雜的全球時代裡確實成為眾所關切的焦點，然而如何設計一套適當的制度因應全球化下的分殊性亦會是解決當代治理困境的重要突破。在學理上，Keohane認為各種政治學理論(諸如理性選擇制度論、歷史制度論、賽局理論或者是民主理論)或許可以提供不同的分析視野，但這些視野之間在本質上仍存在不少緊張關係，故他所揭櫫的「治理」或「適當的制度設計」，其實正是可用以化解這些緊張關係的關鍵(pp.245-271)。最後，在本書的終章，Keohane指出全球化儘管帶來更多的互賴發展，亦產生了另一個效應——非正式暴力的形塑與相關影響。文中之分析不但呈現出全球時代中各式各樣的新安全威脅，亦直接呼應了美國在九一一事件中所受的重創。當然，除了對全球化實際發展的負面效應進行討論外，該文的另一個關懷也間接刺激了國際關係主流理論在新時代中的深層省思(pp.272-287)。

從上述論述邏輯中，讀者可清晰發現Keohane在1990年代的理論研究與創新其實仍是早期學理的累積，只不過相關研究在經驗論證上或概念彙整與精鍊上有著更細膩的突破。這些學理的累積呈現出相對動態的發展型態，<sup>5</sup>透過Keohane在晚近針對制度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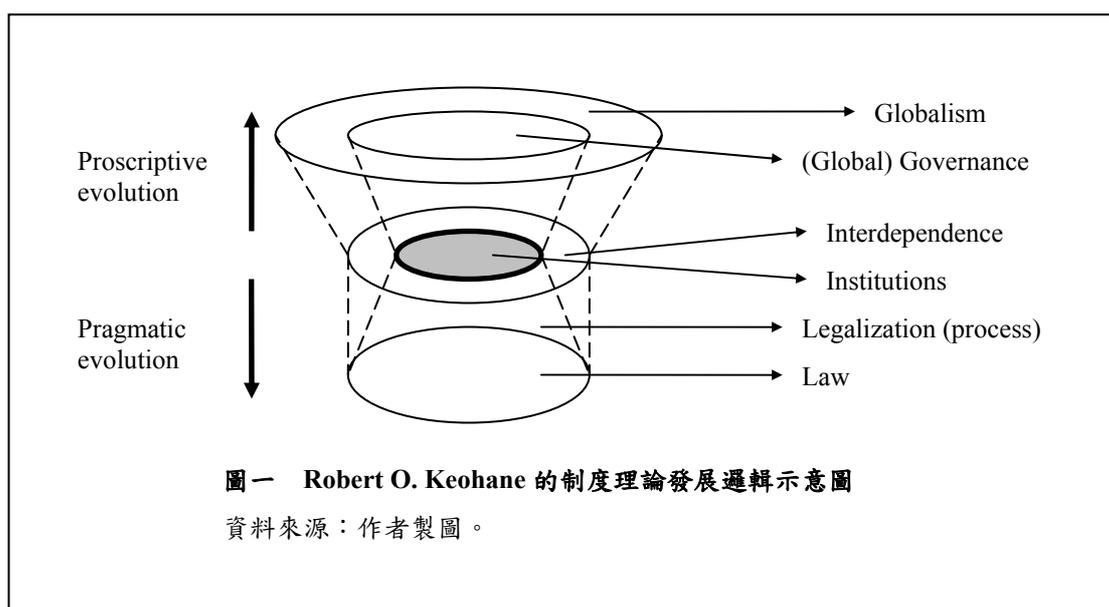
所從事的研究，筆者認為大致可細分為下列兩個演化方向：一為以理論突破為發展目標之「預示演進」(proscriptive evolution)，另一則為嘗試進一步落實理論之「務實演進」(pragmatic evolution)(如圖一)。

「預示演進」強調宏觀層次的理論投射，透過「由互賴到全球主義」以及由「制度到治理」的兩條動線，構築全球時代中的治理基礎，進而彰顯出全球治理的複雜特質。此一「預示演進」係源自於對全球治理特色的詮釋，其目的在於建構出制度理論的理想型，並作為「指導」或「預示」實務發展的重要原則。相較之下，「務實演進」則是揭櫫一個相對微觀且務實的觀點，透過對政治學與法律學的結合，強調全球治理將在不同議題領域中透過制度來落實，而此一落實將與法制化的過程息息相關。事實上，「務實演進」除了提供學術社群諸多學理上與分析上的理想型外；對於實務工作者而言，亦能清晰地勾勒出各種不同議題領域之國際制度的發展與分類。儘管上述兩種演進的發展方向與關懷內容略有不同，兩者間其實有一個共同的發展背景——「從單純的經濟互賴→過渡到相對複雜的互賴關係→演進到更為細膩的全球化世界」。因此，無論是「預示演進」還是「務實演進」都將面臨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何透過更好的制度設計將制度所能承載的功能發揮到致極，並透過治理概念的實踐將理想與現實順利結合。此點正是Keohane在本書中最核心呼籲，同時亦是對制度理論有興趣的學術社群需進一步努力之處。

整體而言，Keohane對於國際關係

<sup>5</sup> 此一動態係相對於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靜態分析架構而論。

理論研究的重要性確實不可言喻，而本書更可說是集其晚近研究之大成，實具學術參考價值。循著他數十年來的理論研究思路，本書確實可以提供讀者一個制度理論發展方向的「宏觀視野」。不過，Keohane 在本書中所多次強調的理論原型或者不斷呼籲的概念，特別是實際制度設計與實踐治理理想間的關係、或者是治理的未來圖象以及治理機制在實際運作上所可能面對的困境等問題，仍需要後進研究者透過更細緻的個案研究與比較，使理論與實務間的對話更為深入，才能讓制度理論的發展更為精煉，進一步追求所謂的「微觀實踐」。在閱讀本書的同時，建議可以將 Keohane 近年來的著作蒐集進行延伸閱讀，如此才能完整理解此一大師級思想家的研究創見。當然，參酌相關學者如 Lisa Martin、Andrew Moravcsik、Helen Milner 等人在制度理論或（新）自由主義等學理上的不同觀點，亦將能使讀者從更為多元的角度來建構完備的制度理論知識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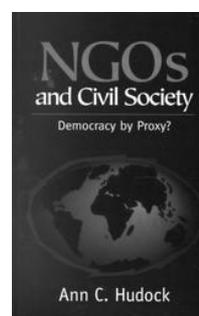
Ann C. Hudock

## *NGOs and Civil Society : Democracy by Proxy?*

吳宗憲 /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生

本書作者 Hudock 在英國 Sussex 大學發展研究所取得博士後，曾擔任世界學習組織(World Learning)的資深顧問，此組織是專門執行國際訓練及發展計畫著名的非營利組織。目前，她擔任亞洲基金會的助理代表，從事政府治理研究並積極促進貧窮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基於這樣的學經歷背景，作者在本書中的觀點便不致落入傳統「公民治理」模式倡議者過於理想化以及缺乏實證經驗的缺陷，而匠心獨運地推演出因果關係邏輯相嵌合的結論，捍衛自己所倡議的觀點。

Hudock 談到，目前南北半球非政府組織互動經年後，原先各界所樂觀期待渠所建立的「夥伴」關係並未發生。其主要原因在於，南半球的非政府組織作為一個「組織」，其運作所必須考量的因素，除了非政府組織所強調的「使命」特質之外，還有著更為隱而未顯、作為一個「組織」與生俱來的宿命——「生存」需求，因此窮困的南半球非政府組織為了延續組織的生存，必須竭力爭取外界(尤其是富裕的北半球非政府組織)的資源。也因此，與其說南北半球非政府組織是一種「夥伴」關係，倒不如說是一種南半球非政府組織對北半球非政府組織的「資源依賴」關係。為能矯正這種狀況，Hudock 提出所謂的「能力建立」模式，主張北半球非政府組織必須揚棄以往由北半球非政府組織教導南半球非政府組織各項工作細節及藉由使用各種考核工具對南半球非政府組織課責的模式，將資源運用於提升南半球非政府組織的自主能力及公共關係能力上。



書名：NGOs and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by Proxy?

作者：Ann C. Hudock

出版者：Blackw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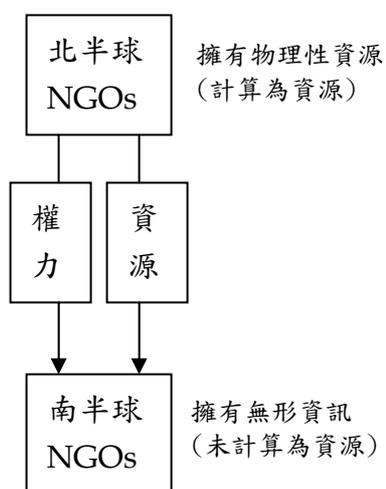
出版日期：1999.年

頁數：120 頁

ISBN：07456164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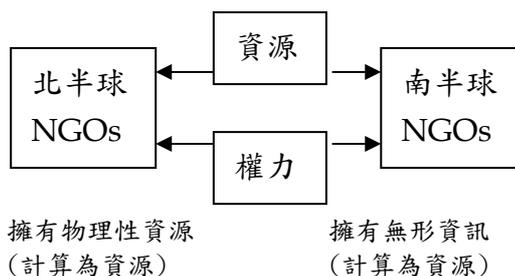
筆者認為 Hudock 最大的貢獻是指出「物理性資源」及「無形的資訊」均應屬於「資源」的一環。在作者的理論中，擁有資源者必然對於依賴資源者產生權力的效果。北半球非政府組織雖然擁有「物理資源」，但卻不具有融入當地草根性民主所應有的當地人際或歷史網絡等「無形資訊」。既然北半球非政府組織並非全面性地擁有所有的資源，自然不會也不應享有絕對的主導權力，因此北半球非政府組織與南半球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互動模式，若採取由上往下的層級節制體系，恐有誤置資源之虞，為了避免這種偏頗，北半球非政府組織採取「授權」方式應係最好的資源運用模式。

筆者試由下面兩圖分析將「資源僅指為物理性資源」(圖一)以及「資源視為『物理性資源』及『無形的資訊』兩者加總」(圖二)兩概念的不同



圖一：傳統的北半球非政府組織控制南半球非政府組織觀點

註：由於僅有物理性資源方為資源，因此根據資源依賴的原則，北半球 NGOs 擁有充分的主導權



圖二：Hudock 的南、北半球非政府組織平權觀點

註：由於物理性資源以及無形資訊均為資源，根據資源依賴的原則，南北半球 NGOs 必須建構互賴關係

然而，Hudock 僅說明了：因為北半球非政府組織僅擁有物理性資源，而未擁有無形資訊，因此採取層級節制方式有其缺陷，必須採取授權方式方能得到最佳效果。惟筆者認為物理性資源及無形資訊，雖然均可作為資源而產生權力效果，但物理性資源與無形資訊仍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前者形成一種強制性的制裁力量，後者則是說服力量的來源。因此，有其必要再進一步區分此兩項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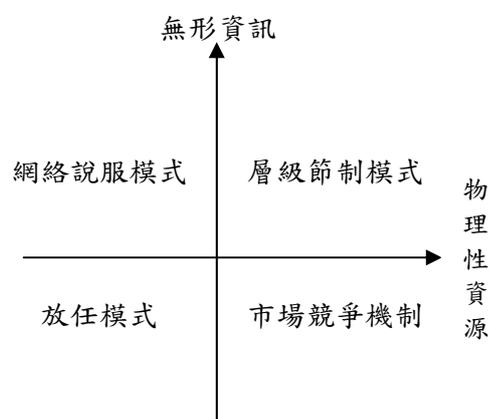
筆者以物理性資源及無形資訊分別作為橫軸及縱軸 (如圖三)。其中第一象限代表的是北半球非政府組織同時擁有物理性資源以及無形資訊之情形，因此北半球非政府組織掌握所有的資源，因此北半球對南半球非政府組織的關係，若能採取層級節制的方式，較能擁有較佳的執行效果。第二象限代表的是北半球非政府組織無形資訊高而物理性資源低的情況(雖然實務上不容易發生這種情形)，北半球非政府組織雖然無法提供資源，惟因了解資源應如何運用方能發揮效果，故

透過「建立網絡，進行說服」方式，較能擁有較佳的合作效果。第三象限則是指涉北半球非政府組織無法提供物理性資源，又不具完成工作的有效資訊的情形，此時則以「放任」為最佳的合作手段。第四象限指涉的則是：北半球非政府組織擁有物理性資源，但資訊卻掌握在南半球非政府組織手中的情況。為了能夠有效地運用資源，北半球可以透過「市場競爭」的方式，藉由契約或者招標的方式，使南半球非政府組織必須不斷增進效能，以便能在爭取資源的賽局中脫穎而出。

根據此一分類學的建構，若回過頭來分析 Hudock 的邏輯，可發現 Hudock 的論述雖對先前相關研究提出批評，惟並未能建構其他互動模式作為參考。而藉由筆者所建構的分析架構，相信吾人未來思考南北半球非政府組織互動情形時，能有一個更明確的指引方向。

近年來，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惟學者若非過於樂觀地高估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便是高度悲觀地否定非政府組織可扮演的功能。Hudock 務實地分析南北半球間非政府組織的互動模式，跳脫「意識形態」的「典範戰爭 (paradigm war)」，絕對是項重大突破。只不過作者雖點出問題所在、並以「能力建立」作為解決方案，惟因該方案係來自作者蒐集有限案例所產生的歸納性建議，若欲全面性使用恐將遭遇問題。欲解決此一問題，須透過較全面性的理論分析方能盡其功。而行政理論界近年所發展的多元治理模式(包括官僚型模、市場機制以及社群模式等)，主

要目的僅係現狀的描述，希望建構出具有互斥性及窮盡性的分類型 (typology)，而非針對實際問題而來，故無法將治理模式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案，甚為可惜。筆者對於 Hudock 之理論的檢討所建構出的多元互動架構，應可補足前述理論與實務分離之缺憾，使傳統上屬於理論層次的治理模式理念型 (ideal-type) 能夠成為一個策略性、權變性的實際解決問題政策手段。



圖三：筆者建構之分類架構

註：箭頭方向代表資源或資訊由低至高。

Kongdan Oh &  
Ralph C. Hassig

## *North Kore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毛維准 /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國際政治  
專業研究生

近年來，朝鮮(North Korea/DPRK)屢屢縱橫捭闔於風雲詭譎的國際浪潮中。核彈似乎成為其攻城拔寨的致勝法寶，六方會談的外交勢頭好像也盡在其把握之中，「不明身份者」闖駐外使館的行為也使其屢次聚焦於鎂光燈下。然而，人們卻對它充滿迷惑和與時代脫節的認知。美國國防研究院(IDA)朝鮮籍東亞問題研究員吳公丹(Kongdan Oh)及其丈夫華盛頓朝鮮事務顧問海瑞(Ralph C. Hassig)窮十餘年資料收集之力、盡三年「切實而卓絕的研究」這個封閉王國(Hermit Kingdom)褪去一層撩人的面紗，展現出一個感性的朝鮮。<sup>1</sup>

這本專著涉及面廣闊，對朝鮮的歷史影響、意識形態、經濟狀況、社會結構和外交狀況予以介紹分析，並予以「策論」。作者在全面考究朝鮮開國近60年歷程的基礎之上，描述並分析了統制其大政方針的主體意識形態的奇特邏輯，同時運用歷史資料並試圖超越意識形態因素而對國家運作予以評判和預測。縱觀全書，固執性(Persistence)和虛幻性(Illusion)這雙重主題貫穿於朝鮮立國發展歷程的始終。

首先，這是一個身披現代設置外表卻內蘊前現代特質的固執國家。保證金家世襲的絕對統治和無



書名：North Kore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編者：Kongdan Oh

Ralph C. Hassig

出版者：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出版地：U.S.A.

出版日期：2000年

頁數：256頁

ISBN：0815764359

<sup>1</sup> 筆者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本書作者吳公丹研究員和海瑞博士的大力幫助並給予其中文姓名的準確翻譯，在此表示感謝！同時，感謝我的導師龐中英先生對我的悉心指導與關愛寬容！文責自負。

上權威是其內在機理；無論是金日成還是金正日，其所有政策無一不圍繞這一目標。當然，實現朝鮮半島統一在金日成時代曾經作為主要努力方向，伴隨韓國的崛起和朝鮮的衰落，朝鮮主導統一的理想漸漸化為泡影，金正日更多地將半島統一僅僅落實在書面上，並使其成為對外鼓吹宣傳和對國際社會進行訛詐的工具。其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經濟發展和外交對策無一不恪守這一律令。

朝鮮在國內建立起森嚴的金字塔式等級秩序：領袖及其黨佔據金字塔上層，子民匍匐於其下，軍隊擔當社會支柱，嚴酷的社會控制和無盡的主體意識灌輸成為維繫之黏合劑。按照民眾對王朝的忠誠度將其社會分為核心階級、動搖階級和敵對階級，並細化為 51 個階層；同時建立龐大的國家安全系統對民眾進行嚴格的思想控制和資訊鉗制等極權控制，輔之以非人道方式來壓制違反者以維持王朝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異化為刀光劍影般地「對無產階級的專制」。國家安全的提供者、王朝社會控制的維持者和朝鮮社會的樣板等角色集軍隊於一身，這種「金家軍」角色定位源於統治者矯造的內外不安全心理過敏狀態中。尤其是金正日推行的「以軍事為首的政策」(Military-first Policy)，佔用國計民生所需的大量資源，在維護朝鮮國家安全的同時卻諷刺性地成為崩潰的隱患，它註定朝鮮生活在國際邊緣和貧困裏。

意識形態是解釋、合法化當前社會政治秩序並為其權力獲得提供戰略途徑的一種信念系統。其功效在於權力合法性建立和權力正當性闡釋。技

藝高超的金日成將「誤讀」的共產主義和中華儒家傳統相結合，建立了金日成王朝：森嚴等級秩序和處於准神靈地位的萬能領袖。它標榜為「以人為中心的革命性世界觀」，是「最徹底的科學理論」。但它既非科學更非理論，而是由無所不能的金家父子創造的若干教條的堆砌。雖然言必稱「主體」，但其思想實質難以琢磨，即使是金日成也語焉不詳。實際上其出發點在於「處處朝鮮優先」的極端國家主義和確保金家主政的最終關懷。時過境遷，主體思想日益被庸俗化，成為處理「從養豬場到外交政策」無所不包的大筐，實用價值消逝，已然完全蛻化為金家父子個人崇拜專制和權力維持工具。

以主權國家而存活還是被韓國(ROK)吃掉是朝鮮經濟面臨的考驗。朝鮮依舊固守的史達林式計劃經濟模式和現行政治體制皆已失效。本為工業化的朝鮮被韓國反超並遠遠落後於韓國，其餓殍滿地的現狀展示朝鮮無視現實的後果。面對數百萬人餓死、人們生活水準急劇下降的現實，金正日卻歸咎於國外封鎖。政府的失職和封閉使物品定量都難以維繫，衣食住行日益惡化。當然，困獸猶鬥，朝鮮也曾進行變革，比如開放羅津先鋒開發區，但是由於統治者不願改變政治體制而危機其自身利益而失敗。吳公丹後來評論道：(朝鮮)基本生存於 19 世紀的精神狀態中，金正日一直窮兵黷武，他並非經濟專家，其改革則是兩天打魚，三天曬網，進一步，退兩步。對外方面，朝鮮飽受攝於強權淪為附屬的歷史，半島分裂更源於大國干涉。由此，極力避免重蹈覆轍的金日

成便對「自主」甚為敏感，為閉關鎖國埋下伏筆。其各種外交政策也反彈於對其相鄰強國的一種自卑和預防心理。朝鮮外交政策原則是防止外國干涉、不依附別國、堅持社會主義正確性和贏得與韓國的零和戰爭，其初衷依舊是維護這個中世紀特質的王朝權力的工具。同時，它又不得不長期依靠於中蘇援助，但又刻意與兩國保持距離；近年中俄刻意淡化與其的關係，朝鮮不得不向仇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尋求幫助，並以「唐吉訶德式」的心態盼望國際社會的認同。同時，朝鮮在國際交往中行事方式過於粗魯和缺少經驗，一方面它有出奇制勝的可能，「看，我是一個堅強的人，我可與布希平起平坐」，但是滿足自尊心的代價卻是別國對其信任的流失及漠視規則的遺棄者(Pariah)角色。癥結在於其固執封閉的邏輯，他們竟然認為國內外事務可以分離，若非國內困難，其國門不會開放。它在國際舞臺上尋求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國際秩序民主化，但這僅是幌子而已，金正日更相信實力政治，因此他維持著龐大的部隊並手搖核彈。

其次，這是一方「充滿虛幻的國土」，朝鮮的領袖和民眾都生活在自己鑄造的「特殊現實(Separate Reality)」中，謊言泡沫充斥在國家自省和展望之中，無能的管理異化為王朝發達的語言藝術和奇特的思維邏輯。

篡改的歷史和無恥的謊言構成這個王朝合法性的地基。為了追求朝鮮前歷史階段中存在的神話人物檀君的合法性支持，「偉大領袖」金日成為自己赤裸裸地製造了一段「神人再世」的偽歷史，並通過無休止的說教賦予

其比真理更正確的地位；「敬愛領袖」金正日的政治崛起、執掌大權、個人魅力、統治方式、現實掌握以及個人崇拜營造歷程與其父王相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主體思想則承載著朝鮮社會主義者的夢想：一個物品極大豐富、無需貨幣的共產主義天堂；而一個仁慈國王統治下的獨立自主、自給自足的烏托邦國家的回歸宿願隱於其下。朝鮮民眾跟隨「偉大太陽」走向天堂過程中，不斷畫餅充饑，「為明天而生活」，或「以槍支和炸彈來保衛我們的領袖」，或通過遙遙無期的「艱苦行軍」推行「我們式社會主義」。這個「太陽」竟以超現實主義的情懷提出「一天兩頓飯」政策！每每政策失敗時，統治者總會以「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邏輯來宣誓經濟的「轉折突破」，滿足自己，麻痺民眾，口號和運動代替了國家的前進。對朝鮮而言，建設「社會主義強盛國家(Kangsong Taeguk)」的路途是緩慢的，也是痛苦的，或許更是虛幻的。

儘管謊言依舊在大量生產，但是泡沫總歸有破滅的時刻。朝鮮社會的信仰也不再是鐵板一塊。精英階層也許相信社會主義必然發生，相信金家的豐功偉績，但是他們已經開始置疑主體思想的適應性。群眾更多的是盲目崇拜金日成和金正日兩個超脫於主體思想之上的「符號」而已。『他們喝的是海水，卻高喊是「檸檬汁」，他們悄悄地回到家中，吐起來沒完。』謊言和錯誤惡化了現在的境遇，一旦真相大白，王朝必然崩潰。

由此展現出這個一意孤行且生活於虛幻中的朝鮮：將領袖地位強加到

人民和民族之上的意識形態；經濟發展以民眾是無私奉獻的共產主義者的假設為基礎；擁有自稱為「世界最強」的軍事力量；游離於世界邊緣的 2300 萬民眾；極力推行「威脅別國即能獲得尊重」的外交邏輯。朝鮮已然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結」。對其進行援助能夠減少其敵意，一定程度上使其民眾生存，但是卻更大程度上加強了朝鮮統治者的力量，延長其獨裁生命；如果現在推翻金氏統治，則半島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中，並且可能引致整個東亞地區再無寧日。其自身也面臨著一種窘狀：追求國家生存必然要打開國門，由此必然損害金家王朝的統治；國門一旦打開，就很難關閉，其精心臆造的謊言必然崩潰。

諷刺圖景或冰火反差的出現源於朝鮮的僵化文化霸權和封建權力系統。朝鮮僵化的主體思想早已處於變革的風口浪尖：它過度強調精神控制，鉗制大眾輿論，鑄就了懸在髮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編按：此為一個希臘神話的典故，比喻臣子正處於暴君控制下，隨時有死掉的危機），造就了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語義中的「病態社會」和「單向度的人」。朝鮮對其主體思想的態度，決定其能否解除根深蒂固的政治慣性並以現實的態度來面對現實，打破虛幻；無力提供公眾福祉的政府，只能認定其失敗。

獨裁體制是這個國度的致命弱點；也許統治者已經知曉國家命門卻不想著手修補，畢竟維繫金氏統治是第一位的，而人民如草芥。在惡性體制中「好的變壞，壞的更甚」——這就是說，即使最好的，最高貴的靈魂也特別易於行惡。這個前現代設置的

獨裁權力體制依舊還在以百萬性命代價而延續著，這個國家的明天依舊不甚明朗。而如何打破這種權力體制，還權於民眾，使民眾有權而又有能力行使權力也是一個挑戰。否則，一切變化僅是幻境。

或者，需要一種安撫金家王朝又加強人民自覺力量的政策。短期而言，應該以援助來「購買」時間，就長期而言，則應採取「預防性介入」政策，不依賴於朝鮮領袖的意願變幻，加強資訊輸入，使民眾逐步瞭解世界，以瓦解意識形態和社會控制兩大夢魘；國際社會應加強多管道介入和合作，解除禁運，啟蒙民眾，將真相還給民眾，讓民眾自己來決定自己的明天。

縱觀全書，作者更多偏重於朝鮮狀況的一般性敘述而缺少相應的細節性論證，論述略微缺乏張力；作者採用大量對朝鮮「叛逃者」的一手採訪資料增加專著的實證力度，但是這些資料暗含太多當事人的個人情感，作者對這種情感的剔除略顯不足；當然這對作者本來不易的資料搜集工作略顯苛求。另外，作者依舊未完全超越預定意識形態和情感因素束縛，對金家王朝尤其是金正日的舉措屢屢予以道德抨擊，略顯過猶不及，同時，作者作為美國智囊機構成員，他們對朝鮮的研究和推論必然服務於其機構的需要，其行文中內蘊深刻的對策傾向；「敵人」鏡像和「無賴」預判的思維方式使專著顯現出某種偏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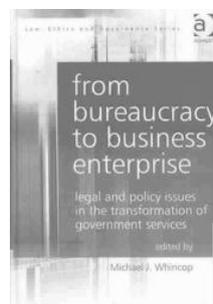
天堂抑或地獄，活著還是死去，對於這個與時代脫節的國度（Anachronistic）還是個問題。

Michael  
J. Whincop

## *From Bureaucracy to Business Enterprise*

王光旭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生

由澳洲研究協會及 Queensland 州政府財政部所支持的研究團隊，本書是研究團隊成員在 2001 年 7 月於 Brisbane 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並由 Whincop 彙整了多篇重要論文加以修改而成。*From Bureaucracy to Business Enterprise* 一書編撰的核心概念其實環繞著一個頗為重要的主軸：在不涉及產權的轉移下，國營企業（文中稱之為：government owned corporations, GOCs）如何透過組織的改造，來完善公司的治理。而國營企業公司化的目的，主要可歸納以下三點：一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但也要實現政府的公共目標；二是要政企分離，政府的部會首長在國營事業的治理架構中，僅能是依法行使權力的股東之一；三是按市場的辦法引進人才，不僅董事會要按市場的規則來遴聘合適的經營管理人員，股東也應該以市場的辦法來遴聘董事會成員，不受政府人事法規的限制。鑑於此，全書在架構上除卻第五章、第八章及第十二章的評論外，共可分為九章，全書主要是透過經濟學的思維加以分析，並旁及管理學、倫理學、公共選擇理論與公共行政觀點的分析論述。本書以 GOCs 公司治理改革的探討為主題貫穿全書，按照內容的區分，在架構上又可分成三個部分：（1）澳洲民營化政策及公司化政策思維的歷史脈絡；（2）國營事業的治理策略，探討組織型態的改革與部會首長擔任股東的問題，也就是內部控制的問題；以及（3）如何提升國營企業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公共性與課責性，換言之，是如何外部防弊的探討。



書名：From Bureaucracy to Business  
Enterprise

作者：Michael J. Whincop

出版者：Ashgate

出版地：U.S.A.

出版日期：2003 年

頁數：199 頁

ISBN：0754622819

第一部份主要收錄了本書前四篇文章，主要的功能便是交代澳洲國營企業公司化政策的歷史脈絡之外，更藉此為引來導出後續內部控制和外部防弊的問題。本書首要的研究目的，是瞭解如何在維持國有的前提下，透過商業化方式的運作極大化公司的價值，並檢驗國營企業在效率的表現上是否能與私人企業並駕齊驅，如何降低 GOCs 的治理成本，是本書所鋪陳的核心論述。由這四章針對澳洲公司化政策的背景討論可知，GOCs 與私人企業難以使用相同的方式管理，我們也難以用私人企業強調獲利能力的要求來規範 GOCs 的獲利能力，建立合理的 GOCs 治理體系，使其有效達成合理的利潤目標並促進公共利益，是有其必要的。因此第二部分的六、七兩章，進入到探討如何完善 GOCs 公司治理的策略。透過兩章對 GOCs 公司治理模式的討論，由經驗的資料證明，特別是政府的股東在董事會對決策與公司治理的影響上，均會對 GOCs 的公司治理產生不良的影響。然對於 GOCs 的公司治理模式的討論與設計的建議，則明顯的體現在如何有效排除政府股東於公司決策中過於政治性的決策思維。

從第九章開始，本書討論的內容便開始進入到第三個部分。第九章聚焦於如何激勵 GOCs 從事公共服務目標的提升，透過對成本效益方式構築治理的防弊規則。第十章將焦點放在董事會的治理環境與課責性的探討，在管制的指導原則上，作者建議針對公共利益的服務輸送，設定特定的法律供以管理董事責任制度，或是設定不同於一般公司法免責機制與例外規

定事項，供以順應分歧的公共目標。第十一章為本書實質上的最後一章，作者透過對 Victoria 政府能源和水資源檢訴官 (ombudsman) 地位與運作的分析，進一步論述了法律上的課責與政治上的課責，主要是對第三部分探討 GOCs 公共服務的課責機制的一個總結。

經由以上對 *From Bureaucracy to Business Enterprise* 一書內容的扼要描述，讀者閱後當可明瞭 1980 年代以來迄今仍如火如荼進行的公司化及民營化政策澳洲經驗的梗概。因本書涵蓋了澳洲公司化政策的發展歷史，對於民營化政策所遭致的反彈、國營企業治理模式的轉換、政府股東在公司決策過程中的角色與影響、如何對國營企業所提供的輸送服務進行法律上的課責，以及對於檢訴官在處理 GOCs 管制過程中的公正角色的約制等議題都有觸及。除了規範性議題的探討，當中也有援引澳洲本身在公司化過程中的一些經驗資料來佐證各章作者所提出的問題，並針對問題提供了相關的政策建議。對於要瞭解澳洲公司化政策所面對的問題與發展，此書確實提供讀者一個極為完整的參考資料，對於單純想瞭解國營企業公司化的議題，本書的內容鋪陳也確實對於想要瞭解公司治理問題的讀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自古以來，在人類發展的歷史當中，人們就一直不斷的在面對問題，也一直不斷的在解決問題。當然，從不斷的試誤 (trail and error) 當中，人們一直在找尋交易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平衡點。在經濟學所探討的主題是如此，公共行政所探討的主題亦

然。Whincop 所編撰的這本書對於想要瞭解國營企業在公司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與可能的解決機制，確實是一本值得參閱的著作，然而在有些議題的敘述上，似乎又有意猶未盡之感。

首先，對於公共服務的輸送，國營企業的存在也許不是唯一的選擇，但卻又不可完全排斥國營企業存在的必須性。私人企業的存在就Coase<sup>1</sup>的觀點而言，是為了降低市場經濟下的交易成本，企業存在的目的本身就是為了有利可圖，藉以減少在市場中搜尋信息、談判、簽約和履約等活動所引起的成本。國營企業的存在，迥異於一般的私人企業，是為了矯正市場失靈的缺失與對社會福利的追求，其發源地不是市場，而是國家行為。換言之，國營企業的存在是國家基於政治目的而建構的企業組織，其組織的目標與設計，自然不以牟利為目的。對於強制導入市場機制促進國營企業內部市場化的改革目標而言，自然容易有格格不入，牛頭不對馬嘴之感。

再者，對於公營與私營而言，最大的不同即在於產權的分別，也就是公司化與民營化最大的不同之處。民營化意指透過產權的轉移，完善公司的治理機制，而公司化則在不更動產權的狀況下，試圖完善公司的治理機制。贊成民營化的學者均著眼於私有產權的效率較公有產權高的判斷，然支持國營事業公司化的學者則認為維持公有產權才能對企業行為中涉及公

<sup>1</sup> Ronald H. Coase, 1910-至今，於199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專長領域在產權理論、廠商理論，現為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法律學院教授，著有代表作《廠商、市場與法律》(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相關訊息請參閱：  
<http://www.law.uchicago.edu/faculty/coase/>。

共利益的部分收課責之效。對於人民來說，面對私有產權的民營化機構，民眾被其視為是顧客的角色以提供消費產品，對於其所提供的消費品，顧客只能夠透過市場機制加以反應對物品的購買需求；唯對於公有產權的國營企業而言，民眾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對於公共服務的品質，民眾有權要求國營企業公共財的提供必須符合低廉的價格與完善的供應品質。據此，對公司化的改革，在不涉及產權的更動上，為了完善治理機制，便明顯的呼應本書所要解決的兩大問題：一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但也要實現政府的公共目標；二是要政企分離，政府的部會首長在國營事業的治理架構中，必須排除其政治性的決策思維與影響。即使本書在董事會治理的問題上提供了諸多的洞見，然在討論議題的鋪陳上，卻明顯的忽略了國營企業與私人企業在產權的殊異性所造成的影響。就North<sup>2</sup>的觀點來說，組織的型態明顯的受到制度架構的安排與限制，對於公司治理問題的觀察雖然符合現實的運作邏輯，但究竟何種公司治理模式才能明確降低運作上的交易成本，想要達到什麼樣的政策結果，便是產權問題所引發的制度架構賦予國營企業何種存續的環境與機會。

<sup>2</sup> Douglass C. North, 1920-至今，一位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學者，於1993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諾斯的研究，從最早確立財產權理論開始，發展到交易成本、經濟史，制度變遷等研究，目前為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經濟系教授，著有《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等代表作，相關訊息請參閱：  
<http://economics.wustl.edu/faculty/faculty.php?id=15>。

第三，新公共管理在批評公共服務官僚制供給方式的低效率時，強調了引進企業化管理模式來提供公共服務，如契約服務、公共服務市場化等。然國營企業與私人企業間並不必然存在著系統性的差異，仍須視判斷的標準而定。換言之，之所以會出現判斷上的分歧，是因為研究者在如何界定效率概念、如何衡量利潤水平、利潤率是否能成為評價國營企業績效的指標、如何評估國營企業的社會收益與社會成本等問題莫衷一是。國營企業的存在有其政策目的，對於非經濟性公共服務的需求基本上無法以營利與否作為衡量。倘若連國營企業均要要求樽節成本，在降低成本的考量下，弱勢團體與成本高於收益的服務性產品勢必被排除在產品的供應項目之外，在市場中可能要透過極其昂貴的代價才能獲得產品。國營企業改革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國家面臨財政財政壓力，然在政府與國營企業的互動賽局中，國家為了支持社會服務的輸送，並無法以隨時退出賽局作為國營企業違約的懲罰，由此導致了國營企業勞動努力程度的下降和資產經營中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的問題，非但政府不能退出，連國營企業也無法有效實施退出的策略，博弈便陷入了一種僵局。這樣的困局，是難以從單純的公司化策略，或是董事會組織的改制就可達成。

第四，文中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等皆以代理人理論的觀點分析國營企業公司治理的困境，以及董事會及管理階層間資訊不對稱的狀況，從事非常細緻的分析。對於國營企業許多內部行為，如：隱瞞工作質量、政

府董事對於監控營運狀態的積極程度，也都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在此筆者仍要指出一點：既然代理人理論是一般化的分析架構，對於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是任何組織都存在的普遍現象，然而國營企業內部所產生的代理問題，是否就殊異於私人企業？雖然在經驗上根據代理理論，也許不難找出國有企業與其他私人企業間代理問題不同的型態，根據這條思路，也許我們可以探知一些組織運作上的問題，但我們是否能從代理理論明顯的找出國營企業獨特的公司治理問題與解決方案，是筆者所要存疑的。

第五，對於公共行政領域的研究者而言，關注的焦點之一往往是政府的最適角色為何？筆者以小窺大，鑑於本書對國營企業公司化的分析，我們是否能深刻的體認到什麼樣的政府治理型態，才是既有效率，又能達成公共利益目標的運作模式。是否一定是要 *From Bureaucracy to Business Enterprise*，才能符合現今環境的挑戰與需求？回顧二十世紀，政府角色的調整與西方的經濟理論發展產生密不可分的关系，整個公共行政理論均在「大」與「小」政府的光譜之間擺盪。殊不知欲面對現今詭譎多變的環境需求，太過拘泥於政府的大小是否還有其意義存在呢？就筆者認為，無論是大政府或小政府，唯有「最有效」的政府才能面對如此不確定的未來。但何謂「最有效」的政府，那就要看在不同的環境系絡之下，所面對挑戰是什麼，政府的組織如我們探討的國營企業一樣，也必須要保持隨時面對環境變遷的彈性。

回歸到本書所探討的主題，公司

化政策要使國營企業變成「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基本上並沒有如 Whincop 等作者所思考的那麼單純。國營企業是一種相當特殊的企業經營體制，它的設立與存在，在經濟意義上，是政府公權力干預或介入產銷活動最直接的方法，在政治意義上，則隱含了政府掌握以及可運用較雄厚的社會資源。筆者並不反對國營企業引進市場競爭的機制，然引進競爭的機制卻無法去改變國營企業原本肩負公共服務責任的事實。公司化雖然在表面上迎合了改革的潮流，但如果我們沒有注意壟斷對公共利益的侵害，如果我們沒辦法體認到國營企業本身在運作上便會有無法如同私人企業般要求的限制，我們則難以清楚的體認到國營企業存在的價值與改革的方向。在深化國營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為什麼要提供公共服務？由誰來提供公共服務？一直是國營企業難以承受之重。政府的存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然而很弔詭的是，管理不善的政府也會對人民的利益造成很大的傷害。爰此，身負公司營利與社會責任的國營企業，基本上是兩個難以共量的企業目標。該怎麼走，該怎麼運作，仍亟待相關領域研究者更深入的耕耘與研究。

Greg Austin,  
Stuart Harris

## *Japan and Greater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Asian Century*

賴郁蕙 / 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21 世紀的全球秩序面臨重新洗牌的局面，作者 Greg Austin 與 Stuart Harris 在 *Japan and Greater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Asian Century* 一書中所強調的副標題，更是透過所謂的「亞洲世紀」(Asian Century) 來強調亞洲未來的活躍角色。在這樣的轉變下，作者特別關注日本和中國在此一結構中之角色。

本書嘗試循著歷史研究途徑，對亞太地區之政經發展與東亞地緣政治板塊的重組進行相關分析。章節安排上，本書之第一章和第八章分別談論日本、中國在世界與亞洲秩序的角色，從結構、規範、制度等不同角度切入；第二章則從理念及態度來探討兩國關係，包括了複雜的歷史背景及意識形態；第三至第四章解析兩國間軍事、安全的關係，特別是台灣的角色具有非常關鍵的影響；第五至第八章則著重經濟、民間交流往來對兩國關係造成的影響。在此，我們可以從下列的幾個角度對全書進行瞭解：

一、就宏觀層次(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之演化所造成的影響與回應)而言：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中，「結構」是不可缺少的分析要素。從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不斷變遷的角度來看，作者認為日本和中國對冷戰結束後由美國主導的一超多強體系有著不同的回應。日本支持美國的強權，在不違背此秩序之下，尋求自己的利益；中國則隨著其勢力上升，透過結合「志同道合」的盟友，想要挑戰美國超級強權的單極體系。在制度和規範方面，日本受到二次大戰影響，反對武力使用 (non-use of force)；而中國在其獨特社會資本主義改革下，愈發融入國際社會，但由於



書名：Japan and Greater China —  
Political Economy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Asian  
Century  
作者：Greg Austin & Stuart Harris  
出版者：C. Hurst & Co Ltd  
出版地：U.S.A.  
出版日期：2001 年  
頁數：368 頁  
ISBN：1850654735

其本身有領土分裂的紛爭存在，對秩序關注的焦點在於「不干涉」(non-intervention)，在這樣的差異下，兩國彼此的互動及在國際社會間的行為當然也就有所不同。

**二、在國際次體系（即亞洲之區域秩序）方面：**日本和中國對於扮演區域領導人的角色躍躍欲試，卻又不敢專斷獨行。亞洲在歷史傳統上，鮮少有區域概念的共識，但是隨著經濟合作日益密切，各國對於區域秩序、制度建立的重要性，愈發急迫與重視。中國幅員遼闊，和多國有領土接壤，不但有邊界的爭議，還有海洋資源劃分不清的問題；日本則是有殖民戰爭的包袱，並一向被視為傾向西方國家。準此，我們可以發現東亞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佈情勢確實是相當複雜的。

**三、在強權國家之軍事或安全互動關係方面：**日本和中國的安全關係是微妙而複雜的，儘管日本在武器科技上領先中國，和美國擁有同盟關係；但中國擁有核子武器以及大量的傳統武器，因此形成了一種平衡狀態。日本和中國在冷戰初期是屬於軍事對立的狀態，建交以後在1978年簽定和平友好條約，直到冷戰結束，在安全議題上採取合作的態度。對雙方來說，最深切的教訓莫過於二次世界大戰，因此雙方對於「不侵犯」彼此，及不挑動戰爭發生...等，有著隱而不宣的共識。在這之中，以台海問題最具關鍵性，作者認為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之下，日本有可能被迫對中國進行戰爭，但這是日本所極力避免的。相較於台海問題，海洋資源及海陸通

運才是日本關注的焦點，因為和日本根本的生存問題有直接相關(pp.99-106)。

**四、在相對微觀的議題範疇方面（特別是經濟相關之議題上）：**除了安全議題的複雜關係外，日本和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稱，例如，文中提及日本對中國的大量官方經濟援助、直接投資，是探討中日關係一個重要的切入點。事實上，日本最早在1979年通過「對華援助三原則」，開始大量對中國進行援助；其目的不但具有商業上的意義，也有外交、策略上的意義。特別是在經濟方面，中國因為其市場廣大，日本政府的經濟援助其實可以為本國私人企業取得商機，而此舉尤為其他國家的企業所羨慕。在外交上，因為穩定的國際秩序有助於日本的發展，是故幫助中國使其被接納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對日本也有益處。同時，亦能藉此建立起中國對日本之軟性依賴，從而緩和衝突和摩擦的發生。晚近數十年來，中國將改革的重心放在經濟上，接受日本的援助不但有實質上的助益，也能向其他國家展示其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

儘管如此，日本的援外政策近來卻出現許多檢討的聲音，特別是對於「大量無原則性投資」的批判。再加上中國發展核武和飛彈試射（1996台海危機）對亞太安全造成的持續威脅，讓日本國內右派極為不滿；就此，在中國經濟實力日漸提升之情況下，是否繼續維持經援便成為一個爭議的議題(pp.183-193)。

特別是在1992年，日本議會通過

「政府開發援助大綱」：人道的考慮、國際社會相互依存關係、地球環境保護、支援開發中國家等四項原則，作為其日後援助的準則。日本政府是否藉由經濟手段成功地改變中國對日本的印象，仍有待商榷，部分中國人民將經援視為戰爭補償，並沒有感激之心；但是兩國間因經濟往來，相互依存提高，形成一致的利益，減緩了衝突發生的可能性。

綜觀全書，本書的弦外之音似乎暗示美國是中-日關係中很重要的一個外在因素。美國、日本、中國形成一種戰略的三角關係（a strategic triangle），三者間的相互依賴及共同利益促進區域與全球秩序，又將為日後的中日關係設下侷限（p.311）。除了強權間的互動結構外，筆者認為受到市場經濟、團結制度影響的全球秩序，以及由此發展出的許多國際制度和組織，一方面將有維持國際社會秩序穩定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亦將約束了各個成員國的行為；例如，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為近來日本和中國摩擦的來源，對於某些區域組織積極擴張權力，例如 NATO，中國也深表疑慮。最後在國際化、全球化等「外在因素」的影響下，我們不難發現，隨著全球化的趨勢，一國之內在、外交政策也必定會有所因應或調整（p.312）。

亞洲甚至全球的秩序在慢慢地改變之中，強權在這場變遷中的角色令人玩味，考量種種因素之後，Greg Austin 與 Stuart Harris 認為中日關係，是可以給予正面期待的，要日本因為與美國同盟的關係，犧牲中國，是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中國也會因為持

續追求內政穩定，不至於在國際上採取激進的作法，台海問題將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另一方面筆者以為「內在因素」的刺激，亦對中日關係有所衝擊。首先是歷史戰爭的遺緒：日本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教科書對太平洋戰爭的詮釋等問題時常引起爭議，導致中國民間抗議不斷，反日情節仍然存在。在此影響下，日本的經濟援助被中國民眾視為戰爭的補償，沒有為改善兩國人民的心理層面關係帶來實質意義。第二部分是資源爭奪問題，一個是重度依賴海外資源的日本，一個是新興開發中且急需資源補給的中國，面對東海漁業資源劃分及天然資源開採問題，兩者間的利益是衝突的。不過在戰爭慘痛教訓的影響之下，日本對軍事發展也相當謹慎，兩國也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覆轍。再加上經濟的相互依賴，日本的經援外交產生了外擴效果，雖然不至於對中國產生牽制作用，但是經濟帶來的效益，使兩者樂於追求和平穩定的關係，可以作為政治摩擦的緩衝。

整體而言，本書從各種角度切入探討中日關係，議題相當廣泛：從宏觀的結構分析到微觀的國內結構分析；在行為者上，從政府層次到民間層次；在議題範疇上從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到低階政治（low politics）。循著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觀點，吾人可以從全書中清楚掌握東亞地區在 20 世紀以來的政經局勢發展，特別是對中日關係中的爭議點及共同利益會有深入淺出的理解。對有心研究東亞區域發展的讀者而言，本書確實是一本相當不錯的參考書籍。儘管

如此，Austin 與 Harris 在本書中似乎是從一個既定角度出發：美國和中國處於敵對狀態，日本有平衡槓桿的作用。然而，誠如中日關係中複雜的各個面向，中美關係也包含許多面向，有些議題兩國存有摩擦，有些議題卻必須合作，兩者間有時為「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有時為「競爭」關係，在這樣互相牽制之下，兩國未必會走上衝突之路。

再者是日本本身的態度，經濟實力大過軍事能力的日本，一向以經濟外交（economic foreign policy）為主軸，用外交手段擴張本國的經濟勢力範圍，同時也以經濟手段增加其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從日本的對外援助政策中可以窺見端倪，高居 OECD 國家對外援助總額前幾名，而其援助對象又以亞洲居多。其中當然不乏許多政治性的考量，從而使得援外政策成為日本外交政策中的一項工具。事實上，此種型態的經濟外交的確收到了成效，致使日本逐漸謀求和其經濟地位同等的政治地位，包括日前和德國等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感受到中國發展的強大壓力之下，日本未來的動向值得我們注目，而這個部份為本書尚未提及卻實屬關鍵之的最新發展。現階段的中日關係中，不難察覺「相互依賴」所產生的強大影響，更間接地呈現了在頻繁交流之後所產生的共同利益。就此，中日兩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兩國均小心翼翼地避免破壞穩定的秩序，而這正意味著中日關係未來將朝著所謂的非零合賽局（non-zero sum game）發展。

儘管全書提供了一個相當宏觀的

視野來描繪中日關係與東亞區域動態的發展，而其論證依據的總體經濟數據與歷史脈絡的詳細描述亦確實地提供了佐證本書理論分析所需的例證。但相較之下，全書在分析上較少見到作者對政治菁英或領導人在中日關係發展上的態度與立場的描述與解釋，而這個相對微觀的部份在外交政策或對外互動關係的研究上亦為不容忽視的關鍵，唯有更細緻地掌握這些微觀變數的演化，才能更精確地理解中日關係與東亞區域發展的吊詭。

許寶強

## 資本主義不是什麼

邱頌恩 /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比較政治組

經過 1950 年代以降的「左、右」之爭之後，資本主義在 1990 年代已初步取得勝利，而部分學者也宣稱這正是「歷史的終結」。雖然意識型態之爭究竟是否已經達到蓋棺論定的階段，在學界仍然有爭議；但資本主義作為當代的霸權意識型態的地位則是學界所認知的事實。一提到「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一隻看不見的手」、「私有產權」等概念往往直接反射在腦海之中，而經學術社群、政治社群以及經濟社群的宣傳之下，這些概念自然而然的就被接受成為一個無可挑戰的判準，並且形成一組二元對立的批判關係，將不屬於「自由」、「市場」、「私有」領域的概念排拒於資本主義體系之外並加以批判。而本書作者許寶強教授對於學界與政界這些資本主義的強烈擁護者提出以下質疑：（一）經濟學家所提出的自由市場，是否真的促進了全民的福利與自由，並且透過市場的調節機制達成最適化、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還是想像多過於真實？（二）資本主義作為一套被認知為最佳的經濟體系運作機制，是自有永有的善，還是受到學術社群以及政治社群透過語言、學術規範以及權力所形成的社會建構？（三）資本主義體系是否是國家走上「發展」這條路徑充分且必要的條件？或者以「經濟發展」、「經濟成長」作為「社會福祉」詮釋的經緯是否恰當？（四）資本主義是否只是一套經濟體系運作的「制度」，還是有其他更廣泛的價值鎖鍊隱藏在這套制度邏輯的背後？



書名：資本主義不是什麼

作者：許寶強

出版者：牛津

出版地：香港

出版日期：2002 年

頁數：312 頁

ISBN：0195933907

針對上述質疑，本書從「**歷史資本主義**」的角度切入，透過「**歷史感**」的要素檢視資本主義在學理與實際上所存在的差異性，以釐清學界與社會大眾認知的偏差，並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對資本主義的新理解。本書行文依其脈絡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即是透過歷史脈絡的檢視，揭示讀者資本主義的「**現實**」是什麼。第二個部分則是解構資本主義、發展主義背後所隱藏的學術、政治以及語言措辭所形成的權力邏輯。藉由實例，以檢證資本主義究竟是如何透過地緣政治的需求以及學術界知識社群的語言建構其幻想的合法性。揭露資本主義之所以受到尊崇與推廣並非單純的由於其制度本身，背後其實隱含著權力與文化的邏輯，無論在政治界或所謂「**知識社群**」的學術界都廣泛的存在，並透過語言的論述進行資本主義造神運動。第三個部分則是指出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另類運作體系現實上更能夠實現民眾的「**福利**」，促進效率以及合理化資源的配置，從而提出「**另類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思考。而最後一個部分則回到作者文化研究的領域以「**否思經濟**<sup>1</sup>」(pp.197-206)反省資本主義的本質，從這個脈絡給予讀者不同的激盪。

當然作者在本書最主要的任務仍

<sup>1</sup> 「否思經濟」此一概念最主要在表達對於「**發展**」、「**經濟制度**」之傳統看法的迷思，由對立的觀點來闡述資本主義作為「**發展**」以及「**經濟制度**」的狹隘理解實際上是一種深刻的誤解，該書以印度「**卡華那**」(pp.184-191) 邦的例子來說明「**不發展**」未必代表「**低福利**」、「**落後**」，事實上正好相反。此外亦可藉由文化研究的層次以及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來解讀資本主義是否如經濟學者所認知的圖像，或者隱藏著另一種面貌。

然是在釐清資本主義的現實，因此引用大量史料數據，同時並耙梳了Immanuel Wallerstein、Karl Polanyi、Braudel、Offer等人對於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研究，對於資本主義所強調的精神概念—「**自由市場**」、「**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私有產權**」、「**效率**」、「**經濟增長**」一一提出歷史證據加以駁斥以論證「**資本主義不是什麼**」。從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年代的觀察可以發現，資本主義中所強調的市場經濟根本上缺乏運作的基礎。而當時的經濟型態仍然存在大量的「**自給自足**」式的生產活動，因此勞動市場並不健全。其次，在產品價格的制訂上亦非按照「**供需**」法則來決定，而是透過產品生產鎖鍊所訂定的價格。因此，就宏觀的脈絡檢視資本主義的發展情境可以得知，市場競爭機制並非起著主導經濟發展的要素角色。回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即便資本主義的相關條件已經相當成熟，過去導致市場不自由的因素也逐漸獲得解決，但是書中也羅列出許多在今日社會中大量不透過市場機制轉移的勞務與財貨，其中婦女的「**家務**」以及「**遺產**」最為顯著。<sup>2</sup>

承上文所述，市場中除了大量無法透過市場機制交易的財貨之外，書中從政治經濟學以及產業經營的角度來說明當代經濟體制其實仍然充滿著與資本主義邏輯相背離的事實。作者透過台灣、香港、日本、新加坡為例提出三個層次的觀察：從國家與經濟社會互動的層次來看，強調亞洲經濟發展成就傲人的資本主義後進國，其表

<sup>2</sup> 遺產和資本等非市場機制的流動佔美國淨財富二至八成 (pp.1~8)。

面上雖然披上資本主義的外衣，但背後所隱藏卻是國家所主導的運作邏輯。從亞洲四小龍來看，國家皆擁有龐大的資源，佔據各項重要的產業，並透過資源配置的扭曲以發展或保持重點產業的成長與生存。即便被譽為「資本主義天堂」的香港，其政府亦透過立法授權當地金融系統得制訂存款利率、以及擁有受理存款的優先特權；其次在房地產方面，政府亦透過政策以及允許廠商的聯合壟斷行為以維繫房市的高價位。這些行為均透露政府與寡佔體系的成員彼此合意，以違反市場機制的方式壓縮民眾選擇的空間從而獲得不合理的利益，甚至為「尋租者」建立誘因體系，而這不論是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或後進國皆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從國際體系的層次來看，象徵全球化自由貿易的制度機制—WTO，書中不僅深究其規範的實際運作也同時揭露其強權政治的邏輯。最後從產業層次來看，以往被認為導致「效率」的誘因—「私有產權」，由日本的「合作社」以及當代流行的「股份制」之企業營運，所有權分散或所有權實際難以歸屬的企業制度亦展現其卓越績效（pp.36-41）。因此作者從歷史的角度省思，「自由、市場、貿易」等概念作為經濟學家腦海中的創造物，實際上是一種想像多過於真實的社會建構，而所有產權與資本主義或經濟發展實際上不具相關性。若干有別於當金融體系的另類貨幣體系（pp.163-202）更有助於解決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自由以及金融排拒，故而認為資本主義至上基本上是一廂情願的看法。

此外，文中在回顧資本主義發展

史時，以文化研究的角度來探討「資本主義」的本質，作者認為對於資本主義的認知不應該只停留在狹隘的「交易機制」，由一群理性自利的人透過這套制度以實現利潤極大化的人性企求。事實上資本主義是在一個更大的脈絡下被塑造，這其中包含著政治、文化、道德、社會等複雜的成分。「經濟人」這樣的概念過於化約交換行為的複雜性，徒然建築一個理論的空中樓閣並無意義。由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或許才能夠理解並洞悉構資本主義之所以成為一種流行背後所隱藏的時代意義、政治需求以及知識社群權力運作的實存現象，從而擺脫經濟學模型素樸的迷思。

《資本主義不是什麼》一書在資本主義變成一種自有永有的霸權意識型態之今日格外令人矚目，作者透過資本主義要素的解構，並將之置入歷史的脈絡，以解構資本主義的神話，此舉雖非首舉，但從華人觀點切入卻也饒富新意。而該書透過史實檢證駁斥數個支撐資本主義的重要前提概念，以推論經濟學學理模型所演繹之結果實際為假，而勾勒出「資本主義」其實不是多數人所理解的結論，資本主義要素的發展亦非透過自由市場的機制發展而成。更重要的是經濟的發展史與資本主義所提倡的原則實際上背道而馳，因此資本主義所提供的理想充其量是一種想像。此外，作者透過語言詞彙運用的文本分析亦呈現出「科學研究」在實際上並非科學，而是透過語言的渲染以及武俠小說方式的陳述使讀者在不覺中失去理性與科學的判斷準則，進而接受對於資本主義的論述，然後又透過科學的語彙以

及社群的規範將這些「知識」科學化的包裝，以造神的方式達成真理渲染的效果，這對於「科學研究」無疑是一大諷刺。

然而本文較為可惜的是，文中對於資本主義的描述，僅僅萃取一些「概念」加以否認，此舉若僅以邏輯的推論結構來看並無大礙，若將此推論置入資本主義這一多層次且極為複雜的概念中，推論的有效性則不無疑問。作者如果對於批判的標的選擇以及其代表性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說明，立論將更為堅實。其次，作者不同於經濟學家透過演繹的途徑去分析經濟現象並提出理想的情境為何，而是從歷史過程論證現實並非如此，亦認為資本主義不可僅止於「經濟制度」層次的理解，應擴大至文化脈絡的認知。實際上這些見解並未能夠有效的反駁經濟學所提出的圖像，因為經濟學理正是要將過於複雜的現象化約成可控制的變項以進行分析，前者的批評主要在於忽略了兩種研究途徑的不可共量性；經濟學所建構的演繹模型從純理論的層次來看並無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研究者對於模型所演繹的理想投以一廂情願的態度，模糊了現實與理想之間實踐下的差距，進而忽略了學術研究者在「事實」與「價值」間的分寸。而這正是本書所欲提醒學者慎之、戒之。不過就整體而言，本書對於資本主義提出多元的切入角度，以彌補經濟學理缺乏歷史感的遺憾以及過於窄化對於資本主義認知的廣度，為該書奠定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從政治學門的角度觀之，特別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中，對於資本主義與發展之間的相關研究不乏對資本主義的

質疑與權力邏輯的反省，但多偏向於概念上或實證上的反省，而該書的歷史資本主義正可以提供學者另外一種研究與思考的理路。最後，做為一本在深受西方殖民遺緒的華人社會中有系統反省資本主義的中文書籍，反應學者開始去反省「西方」的努力，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王銘義

## 對話與對抗—— 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較量

蘇軍璋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書的作者，王銘義先生，是一位資深的媒體人，由於他自從 1990 年代起就開始採訪兩岸新聞，對兩岸事務掌握的程度可以說是十分驚人。

而「對話與對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較量」這本書，就是作者以一個新聞從業人員的角度，透過翔實地紀錄影響海峽兩岸發展的歷史事件，輔以新聞從業人員較能接觸得到的「機密消息」，再加上作者求學過程中政治學養的背景，構建成這本好像小說一樣曲折精采的政治性書籍，讓讀者能經由這本書重新回顧兩岸分治（特別是江、李迄今）以來重要的互動及其影響，只要是對兩岸事務關心的人，我想，這都是一本不容錯過的書。

書中共談三大主題（海峽風雲、兩岸交鋒、主權魔咒）、十四個小主題。每個小主題幾乎都是採取「倒敘」的手法，以最晚發生的事件當背景，逐漸引出導致這個事件發生的時空環境。

首先談的是兩岸之間的互動（即海峽風雲部分），作者指出，歷史上，兩岸曾數次瀕臨戰爭邊緣。2004 年 5 月，在陳水扁即將發表連任演說前，北京當局發布「五一七聲明」，在聲明中明確指出陳水扁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懸崖勒馬，發展兩岸關係；一是一意孤行，最終將玩火自焚」。

「五一七聲明」使國際及國內輿論一致認為兩岸關係形式嚴峻，而「五一七聲明」所代表的是北京當局四年來對陳水扁定調以及兩岸關係互動的結果。2000 年陳水扁甫就職，北京方面祭出「聽其言觀其行」的策略，兩年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



書名：對話與對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較量

作者：王銘義

出版者：天下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5 年

頁數：340 頁

ISBN：9864174193

啟動了中共中央宣傳機制的文宣攻勢，署名「新華社評論員」的文章「危險的挑釁：評陳水扁的分裂言論」強硬批判陳水扁是一個「麻煩製造者」。作者認為，從府、院、黨後續的反應中看出，所謂的「一邊一國論」其實是「意外的擦槍走火」，不少民進黨人士在錯愕之餘只得會商討論後續處理辦法。其中，以蔡英文「赴美滅火」最受關注，蔡英文在駐美代表程建人陪同下會見了傳言中掌控美國對台政策的「三人幫」的其中之一，副國務卿阿米塔吉，雖說蔡英文直指陳水扁所提出的「一邊一國論」的本質並非意圖改變台海現狀，但作者認為，「『一邊一國論』正式引爆美台互信危機，是布希政府對陳水扁採取不信任態度的關鍵起點」。

接著上場的是 2003 年的「公投綁大選」事件，也使得華府與台北之間陷入另一次動盪。（這也是本書的第二部分「兩岸交鋒」。）2003 年 11 月，陳水扁在台北慈祐宮建宮 250 週年慶祝活動上宣示了他即將啟動所謂的「防禦性公投」，「為了避免台美關係出現裂痕，陳水扁陸續派出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國安會副秘書長江春男... 等人，相繼趕赴華府澄清立場」，雖然如此，國際社會對陳水扁的立場並未表示同情和理解，包括時代雜誌、金融時報、遠東經濟評論... 等國際主流媒體，都將台海兩岸即將引爆的衝突歸責於台灣當局。

不久，華府便秘密派出莫健（一般認為的「親中派」對台有敵意）為「總統特使」，帶來布希總統要交給陳

水扁的親筆信，作者認為這封親筆信反映了美國政府對民進黨政府台海政策的不安和憂慮。據說，莫健在與陳水扁的對談過程十分不愉快，這次特使事件顯示台美關係出現另一個警訊。幾天之後，布希前往中國大陸訪問，更是當著溫家寶的面直接點名批判「台灣領導人」，據說布希還曾在白宮用許多美式髒話指責陳水扁的言行。一般認為，布希政府應是近二十餘年來對台最為友善的美國政府，不過短短數年，台美關係就呈現空前緊繃狀態。

兩岸之間的互動，不僅影響了台灣、中國大陸、美國的三角關係，中國大陸更是檯面化地直接介入 APEC 會議。APEC 會議所作決議雖然並不具備實質拘束力，但是對台灣而言卻是一個能直接接觸國際強國的平台，況且 1993 年第五屆年會時，「柯林頓總統更倡議提升會議層級，除了例行的部長及年會之外同時舉辦亞太各國最高領導人參與的『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於是，從該屆起，APEC 主辦國對處理台灣出席問題幾乎達成一種共識，就是由主辦國領袖派遣特使赴台灣遞交邀請函，並請台灣另行指定「領袖代表」出席會議。

直到 2001 年，主辦國輪到中國大陸，他們並沒有依照往例派遣代表，就連邀請函都是由「傳真機」送來一張語意模糊的函件，是告知大陸將在該年六月舉辦「貿易部長會議」，但信函並非正式邀請函，也未指定出席者，甚至沒有邀請人的署名。面對這一連串不友善且不依循往例的舉動，陳水扁政府也決定「不依循往例」並

公開宣布希望能親自出席「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

事後證明，陳水扁政府對此次事件的處理方式完全是誤判之下的決策。2001年的會議，是各國元首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國際會議，也是世界各國關心反恐議題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重要聚會，然而台灣不僅在會議代表上與主辦國僵持不下，就連在上海參加部長級會議的林信義也無能替台灣爭取對世界發聲的機會。原本，「缺席」是為了突顯中國的霸道，但卻因為過度消極的決策使台灣陷入「自我邊陲化」的困境。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是談到了「主權魔咒」。作者認為，之所以會有「主權爭議」是因為當初毛澤東等人，經過一連串秘密會商之後，決定將國號正式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定調後幾天，國民政府正式以「中華民國」的角色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定位為「漢奸政府」。就在蔣介石搭乘「中美號」離開成都時，似乎確立了兩岸複雜糾葛的主權爭議問題。1996年，梁肅戎一行前往北京會晤江澤民，在談及主權議題時就曾提到，兩岸統一後國號可否直接簡稱「中國」？江澤民當場表示同意。

「中國」這個名詞的使用至少上溯至周武王，因此，「中國」的具體意涵其實蘊含著相當精采豐富的文化意義。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誰是「中國人」？誰是「台灣人」？這個複雜的認同問題其實由來已久。近四百餘年，台灣經歷西班牙、荷蘭、明鄭、清朝、日本以及國民政府的統治，由於與大陸擁有不甚相同的歷史過程，

台灣土地上的人民對自己的國族定位也趨向複雜，這從歷次民調中不難察覺。

作者認為，即使台灣人民擁有複雜的認同取向，但是在與中國大陸進行政治角力的時候，「台灣力爭擺脫傳統君臣隸屬的從屬關係，強化兩岸主權互不隸屬的平等地位」，就好比清朝與明鄭時期的對立，鄭氏政權由於堅持「不剃髮、不投降」的原則，使得歷次和談破局，導致清朝最終選擇以武力統一台灣。作者認為，「歷史殷鑒不遠，清鄭之間的『剃髮之爭』猶如現今兩岸『誰是中央』爭議的翻版」，因此兩岸應更為妥善地處理主權爭議問題，不要將兩岸再度推向戰爭的邊緣。

就像前面所提及的，個人認為，這本書的價值在於不是單純「就事論事」而是把讀者帶往更深層的歷史脈絡，作者應該是希望讀者能「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因此，在書中時常回顧許多史實，上自商周，下至清朝、日據時代、國民政府，當然更多地是描述近十年來兩岸之間、美中台乃至於國際社會對於兩岸事務的影響及關注。不同於一般媒體記者的，就是這本書運用許多史實輔助其論述的鋪陳，而其中，特別是關於清朝與明鄭之間的互動，個人將提出三個不同意見，或許是對史料解讀不同，不過我還是把我的看法提供給各位參考。

首先，作者指出，由於鄭氏政權堅持「不剃髮、不投降」的原則，但是都未獲清廷同意，而使得歷次和談破局，導致清朝最終選擇以武力統一台灣（康熙21年）。

然，根據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

在 1980 年代整理出的「康熙統一台灣檔案史料選輯」和「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兩份文獻以及清朝人江日昇所著的「台灣外誌」一書（以下史料主要來自於此三者）中均可得知，清朝早在「康熙 16 年（1677）」即同意鄭經提出的「朝鮮例」（不必剃髮稱臣），因此，個人認為作者在這段論述中有明顯錯誤。當時主要招撫者為康親王，前後共計兩次（同一年），前次不許朝鮮例之請並整兵欲攻台，後修書一封：「昔箕子，殷之忠臣也，殷祚既滅，不得已就封朝鮮，以存殷祀。...夫田橫雖義，非箕子比也。願貴君臣同於箕子，勿踏田橫故轍。何不罷兵休士，全車甲歸保台灣，自處海外賓臣之列？其受封爵惟願，其不受封爵亦惟願。我朝廷亦何惜以窮海遠適之區，為爾君臣完全名節之地。...執事如知感朝廷之恩，則歲時通奉貢獻，如高麗、朝鮮故事。通商貿易，永無嫌猜，豈不美哉？」

其次，是關於作者提及的，「清朝堅持『一個清朝』的原則」的論述。

根據史料，清朝並非堅持明鄭是屬於清朝的一部分，而是認為他們同屬「中國人」。這點從康熙 8 年 9 月，康熙帝敕諭中及可窺之一二，「...至於比朝鮮不剃髮，願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朝鮮係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果遵制剃髮歸順，高爵厚祿，朕不惜封賞。即台灣之地...允其

居住...如不剃髮投誠，明珠等即行回京。」而且，自從順治帝起，就把明鄭當成是一個與自己較為親近、非屬叛亂、只不過是因為明朝因素而存在的政權。因此個人認為作者提出的「一個清朝原則」是有點言過其實了。

最後，作者提到：「明鄭『始終』都在爭取『對等地位』」。

然而，其實鄭成功在談判初期是接受「受降為臣」的，雙方爭論的焦點只是在有多少給鄭成功軍眷安插的省份而已，首次正式談判（順治 11 年），順治帝授與鄭成功海澄公的爵位，鄭成功也沒有推辭。所以，吾人認為，作者在這點上過於「烘托」明鄭政權，因為明鄭在剛開始（鄭成功初期）爭取的是「投降後的人事安插權」；中期（鄭成功後期及鄭經初期）爭取的才是近似於「對等地位」的「朝鮮例」；後期（鄭經後期）想要的也只不過是一個「海島」的通商貿易權。因此，明鄭一脈並非如作者所想像的「『始終』都在爭取『對等地位』」！

當然，對史料的解讀也許可以因人而異，個人也只是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雖說我對這幾個歷史問題有些微看法，仍無損於我對這本書的正面評價，這的確是一本希望深入探索兩岸事務的人不可或缺的一本好書。

連玉如

## 新世界政治與德國外交政策——「新德國問題」探索

李 敏 /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生

冷戰後，德國的分裂問題剛得到解決，一個「新的德國問題」展現於世人面前：統一後的德國將在變化了的國際關係中奉行何種內外政策，是繼續堅持 1949 年以後西方一體化的政策，還是重蹈「德意志特殊道路」覆轍？雖然國內學者就「新德國問題」都作了不少的闡述，但唯有北京大學連玉如教授系統地整理成書。該本書中核心論點是，「德國不會重蹈歷史覆轍，因為德國 1949 年開始的西方一體化不僅成功實現，而且得到鞏固。」(頁 502) 對此，作者分別從理論推導和歷史分析兩個方面加以論述。下文對該書作簡要介紹和評論。

### 一、德國外交政策「延續性」的理論模式

二戰後西德一直堅持「正常化」過程。作者獨樹一幟地提出，「正常化」過程既不是以 90 年德國統一為終點，也不是以 94 年俄國從德國撤軍為終點，而是在 2001 年施若德派兵支持國際反恐時才完成，因為此是德國除了客觀上已經完成了國家統一之外，更在主觀上突破了對外軍事克制的禁區。但作者認為，德國在軍事安全領域內的「正常化」與西方一體化政策的「連續性」是並行不悖的，因為這兩個過程不僅是同步發生的，而且在爭取實現平等目標——主權獨立和實現國家統一上具有根本一致性。(頁 15)

在考察和分析統一德國外交政策的「延續性」時，作者引用並探討了德國學者 Volker Rittberger 的三種理論模式：「權力國家」、「貿易國家」和「文明國家」(如表)。現實主義關於實力增長對國家外交政策的影響有兩種看法，以 Kenneth Waltz 為代表的



書名：新世界政治與德國外交政策

——「新德國問題」探索

作者：連玉如

出版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2003 年

頁數：554 頁

ISBN：7301058861

新現實主義理論認為，行為者實力增長後會最大限度地追求本國在國際上的獨立性，據此，統一德國將會更加熱衷於單邊行動和游離於國際機構；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國家實力強大以後將會最大限度的追求其國際影響力，據此，強大起來的德國將努力擴大其對國際機構集體決策的影響，以此來為本國利益服務。自由主義理論認為「權力國家」模式早已過時，這以「貿易國家」提出者 Richard Rosecrance 為代表，<sup>1</sup>此類觀點認為，雖然「貿易國家」也同「權力國家」一樣追求物質利益，但前者強調社會物質福利而不是國家權力最大化，強調絕對盈利而非相對利益，據此，「貿易國家」理論更加看重統一德國在國家、社會和國際地位方面結構上的連續性。理想主義理論認為，國家行為的驅動力是 Max Weber 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價值理性」（Wertrationalitaet）<sup>2</sup>，它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觀念」，國家會根據其價值理性為國處世，據此，Hanns W. Maul 提出了「文明國家」概念，<sup>3</sup>認為德國已符合「文明國家」標準，在對外關係上，德國將以人權和民主等價值為取向，致力於國際分工和納入相互依存的國際合作體系中。在考察了德國的發展援助政策、歐盟憲政政策和北約框架內的安全政策之後，Volker

<sup>1</sup>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86.

<sup>2</sup>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5. Auflage, Tübingen 1980.

<sup>3</sup> Hanns W. Maul, "Zivilmacht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ierzehn Thesen fuer ein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Europa-Archiv*, Folge 10.1992, S. 269-274.

Rittberger 認為，對於德國外交政策實踐，「文明國家」解釋力最強，「貿易國家」次之，「權力國家」解釋力最差。

4

表一 外交政策理論模式：(頁 23)

	權力國家	貿易國家	文明國家
理論	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理想主義
主導分析概念	權力	福祉	普世價值
理性類型	目的理性（相對權力）	目的理性（絕對贏利）	價值理性
目標	自主和影響最大化	福利最大化	文明化
主要政策風格	強迫、單邊主義	合作交流、功利性多邊主義	以理服人、法治化、多邊主義、對外干涉

但連教授認為，以上三類模型皆過於理想，現實政策的複雜性要求存在一種混合型的理論模式，因此作者提出，德國奉行的是以「文明國家」為價值內核、現實主義的「貿易國家」的對外政策。首先，「權力國家」模式雖不能解釋 1949 年以後西德外交政策的本質內容，但西德外交政策發生和發展的全過程是現實主義的。其次，二戰後德國的外交政策追求自由主義「貿易立國」模式，這是德國立國之本。第三，德國奉行的外交政策具有「文明國家」的價值規範內核——民

<sup>4</sup> Volker Rittberger, "Deutschlands Aussenpolitik nach der Vereinigung-Zur Anwendbarkeit theoretischer Modelle der Aussenpolitik: Machtstaat, Handelsstaat oder Zivilstaat?" in Wolfgang Bergen/Volker Ronge/Gerog Weissen (Hrsg.), *Friedenspolitik in und fuer Europa*, Opladen 1999.

主與和平，並主張世界應按西方民主政治規則運行，解決爭端時，應以法律取代權力；以和平取代暴力。當然，作者在綜合了三大理想模式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理論模式的簡約性。

## 二、皈依西方的實現和鞏固

如果說導言中提供了基本的理論分析框架，那麼該書主體部分詳細闡釋了，德國是如何實現其融入西方的政策（第一章至第八章）以及統一後繼續保持其西方一體化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第九章至第十二章）。

美蘇冷戰大背景和德國分裂的歷史條件下，一方面美國希望將德國納入冷戰軌道，這既有利於穩定西歐，又有助於美國稱霸全球，但是另一方面，許多德國政治精英對戰後德國外交所賴以產生的國際形勢嚴重性估計不足，如 Karl Kaiser 關於德國扮演歐洲「橋樑」的中立主義性質的方案、社會民主黨主席 Kurt Schumacher 關於德國充當「第三種力量」的民族主義的方案，這導致他們的方案缺乏可行性。而 Konrad Adenauer 的西方一體化政策主張則可以概括為以法德和解為中心的歐洲主義，他的關於歐洲聯合的構想完全適應了當時西方國家的口味，特別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需要，於是 Konrad Adenauer 就順其自然地登上了歷史舞臺。

具體而言，德國西方一體化包括了兩個過程：第一，政治價值皈依西方，即成功地實現了非納粹化改造和建立穩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即使德國統一如此劇烈的政治動盪也沒能夠動搖德國政治制度的根基。第二，外交戰略皈依西方，這意味著，德國在處理三

對矛盾過程中——德法關係和德美關係的矛盾、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矛盾、對蘇關係和與西方關係的矛盾，都立足於融入西方。

那麼為什麼德國統一後，還能保持其西方一體化政策的呢？作者認為三方面的因素鞏固了德國的西方一體化政策。第一方面涉及德國的外交決策，在理論層面，德國政治精英認為，「後冷戰時期」新世界政治結構特點是「複合型相互依存」，德國嚴重依賴於國際社會安全和穩定；在操作層面，德國外交決策出現了愈來愈多國際化、特別是歐洲化的趨勢。第二方面涉及德國外交政策的國內社會基礎，不僅國內政治精英認可西方一體化政策，而且德國獨立市民社會有助於鞏固歐洲化政策，就連東德加入西德本身也一個西化的過程。第三方面涉足了德中關係領域，德國處理對華關係以國家經濟利益為重，從而非常明顯地體現了德國所堅持的具有「文明國家」內核的、現實主義的「貿易國家」外交政策。

## 三、從「遲到的民族國家」到「超前的民族國家」

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德國正從「遲到的民族國家」變為「超前的民族國家」。所謂「遲到的民族國家」，指相對於其他西方大國而言，聯邦德國遲至 2001 年，才真正發展成為一個正常的民族國家，即擁有內政和外交完全自主權的、統一的、既在客觀上也在主觀上獲得國際平等的民族國家。所謂「超前的民族國家」，是指德國這時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而是「超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即對外奉行的不是現實主義的「權力」外交政策，

而是具有「文明國家」內核的「貿易國家」外交政策。(頁 502-503) 這種「超前的民族國家」表現為在 9.11 之後德國推行的「國際秩序政策」。它主張打破現實主義的傳統觀點，強調政治的整體性（即國內、國外政策界限的突破）以及安全內涵的廣義性和不可分性。(頁 512) 德國則成為實施該秩序最為重要的「文明國家」行為體，但是這條路並非一帆風順。

#### 四、總體評價

該書以新德國問題作為探究的主題，系統分析了二戰以來德國在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兩個方面的西方一體化過程，論證了德國外交政策保持連續性的理論假設，並得出德國外交政策「超現代國家」的發展趨向。在這個論證過程中，該書表現出三個主要特色。

首先，作者把國際關係的發展進程和國內的社會結構、政治文化的變化相結合來解釋德國外交政策的演變。一方面，德國的分裂、西方一體化、統一，都是東西方國際關係演變的產物；另一方面，國內政治對於西方一體化政策不斷加深的認同保證了該政策的延續性。這種研究方法提供了理解德國外交政策獨特的視角。

其次，作者以歐洲的普遍性與德國的特殊性這對矛盾的解決來理解戰後德國的外交政策。歐洲近現代源於歐洲的共性難於抑制住各國的尤其是德國的個性。<sup>5</sup> 但二戰之後，聯邦德國用西方一體化替代了「德意志特殊道路」，最終融入了西方。(頁 523)

第三，作者闡述戰後德國外交政策連續性也獨闢蹊徑。無獨有偶，Josef Joffe在《德國：從菲特列大帝到聯邦共和國》中也提到了德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不過，Josef Joffe認為，德國地處歐洲大陸腹地的位置和其大國地位決定了德國在百年外交實踐中的連續性——扮演歐洲東西關係仲裁人的角色；<sup>6</sup> 而連教授僅探究二戰後德國外交政策「連續性」，作者除了考慮德國地緣位置的重要性，更強調二戰後初期德國採取的融入西方政策所產生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 對於此後外交政策的作用。

但是該書也有值得商榷之處，特別是其結論——德國將堅持具有「文明國家」價值規範內核、現實主義的「貿易國家」外交政策。首先，作者將德國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內涵更多限定在冷戰時代和追求「正常化」目標上，對德國實現「正常化」目標之後的「現實主義」的內涵並未作論述。其次，如何協調「貿易國家」和「文明國家」這對矛盾。前者以經濟利益為重，後者強調外交政策遵循「民主」和「和平」這兩大價值規範，假若兩者出現衝突，何者為先？

到底德國及其歐洲能否實現由「權力國家」向「文明國家」的轉變，不僅需要實踐的檢驗，更離不開理論的進一步論證。

<sup>5</sup> 郭華榕：《1918-1945 年歐洲分裂的歷史教訓》，載《北京大學學報(歐洲歷史研究專刊)》1997 年，第 15 頁。

<sup>6</sup> 約瑟夫·喬菲：《德國：從菲特列大帝和聯邦共和國》，見《世紀之旅：七大國外交風雲》，羅伯特·A·帕斯特主編，胡利平 楊韻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93-158 頁。

## 【徵 稿】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 投稿須知

■徵稿對象：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稿件內容：

- (一) 一般書評：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長篇書評：徵求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長篇書評，內容包含 3 至 6 本相關書籍的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之書評的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截稿日期：每年二、五、八、十一月十日以前。

■稿件筆潤：

- (一) 一般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元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元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本刊物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唯保留此項權利。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mailto:PoliSciReview@ntu.edu.tw)
- (二) 一般郵寄：台北市中正區(100)徐州路 21 號  
臺大政治學系[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